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术主持人:张秀琴)·

西方左翼对《资本论》 语境中“价值形式”的两种阐释

孙亮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241)

〔摘要〕 着意从《资本论》的“价值形式”一节“学到一些新的东西”,西方左翼思潮中存在着两种对价值形式的阐释方案:借助《大纲》中一般智力引发的“非物质劳动”占据主导的资本主义时代判定,认知资本主义以“度量危机”否定了价值形式,但实质上他们否定的只是具体劳动的价值形式量化的难题,根本没有触及到抽象劳动意义上的价值形式的质这一维度。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则借助《资本论》“价值形式”进行批判理论的阐释,用阿多诺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方式,指认资本概念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结构的一致性,将“价值形式”自主化,取消了现实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价值形式所蕴含的表现机制是与生产领域勾连在一起的,它需要以更深入的方式回溯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上才能给予厘清。

〔关键词〕 认知资本主义;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价值形式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1]05-0035-07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1.05.007

“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①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对“价值形式”重要性的提示。“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指的到底是什么?这恐怕是我们在解读《资本论》时最想知道的。但是,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即借助此问题生发出更多对《资本论》的阐释,从而以此推进实践效应。今天,当我们朝向晚期资本主义建构一种有力的批判理论,并且希望能够超越它而展开对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无尽想象时,我们愈加觉得价值形式成为了这一事业的“入口”,这种说法并非是我们信口开河。除了借助“价值形式”一节的辩证方法论可以集中展示其对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意义”之外,即它内在地显示了叙述方法遵守着形式(抽象)的结构与内容(质料)世界的同一性原则,形式(抽象)的结构与内容(质料)世界的同步发展、完全平行的原则,并且形式成为了质料追求的一个目的。同时,这一辩证的方法论也指向了研究方法,它要求的是

-1858 年经济学手稿》(简称《大纲》)的关注,所谓“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声音引发了不小的思想震动;后者则回到了《资本论》的“价值形式”一节,并以此去设想一种个体意义上对自身劳动方式的重构,从而试图恢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这与马克思站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上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相距甚远。从文本依据、学术观点、思想旨趣角度而言,西方左翼的这两种对“价值形式”的阐释均不相同。那么,他们对价值形式理解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又存有哪些缺憾?理清这些缺憾可能决定着我们能否向前推进一步,摸索出值得探索的方向在哪里。故而,在我看来,围绕这些问题尝试性地给予批判,将极有可能触及到马克思所说的“新东西”的发源地。

一、认知资本主义与价值形式的逾越

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在汉语学术界受到的关注不多,而学术界对意大利的自治主义较为熟悉。依照我的看法,认知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的资本积累方式,人们生存于其中,而自治主义不过是对此类资本主义抵抗方式的筹划,其实践形态便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意大利都灵地区爆发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认识到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正确的抵抗策略,也是通向未来之路。认知资本主义与意大利自治主义之所以能够放在一起谈论,就在于资本主义呈现出“认知资本主义”形式时,如乔治·索加(George Tsogas)所看到的那样,“认知”一词(来源于知识)表明,我们处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知识的积累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个术语将生产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与生产组织的特征结合起来,而生产组织现在是基于知识的。因此,认知资本主义描述了当代社会的一个广泛的组织原则。^①这种原则首先就体现在它与原先的工人主义(Operaismo),即将工厂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将工厂工人视为革命主体的思路完全不同了。后工人主义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工厂之中,“社会即工厂、生活即劳动”。这一视角的转变之所以如此,是通过对生产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经验上的理解而得到的。从理论上对这一转变进行分析,则以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为主要代表,还有博当(Boutang)、乔治·卡芬特齐斯(George Cafentzis)、韦尔奇诺(Vercellone)、维尔诺(Virno)、马拉兹(Marazzi)以及拉扎那托(Lazzarato)等一大批学者。他们主要聚焦于《大纲》的“机器论片段”中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范畴,将这一范畴视为资本主义发生转变最为根本的秘密和最具有表征性的特征。无论是认知资本主义还是自治主义,都认为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生转变和解放所设想的根本出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认定未来与知识和科学技术成为主导的生产力相关,“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

的新型生产方式,只不过他没有径直地采用施托尔希的术语。在认知资本主义的左翼思潮中这一词汇又被重新翻起,“大多数服务的确以信息和各种知识的持续交换为基础,既然服务的生产导致缺失物质的和耐用的物品,我们将这一生产所涉及的劳动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①。大致地分类,他们主要集中地描绘了两种主要形式的非物质劳动:第一种主要是智力或语言的劳动,如解决问题时符号化的和分析性的任务,以及语言表达。这是一种广为人知的、被广泛理解的知识工作,它产生思想、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图形、图像和其他类似产品,“这类活动涉及定义和确定文化与艺术的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规范以及更具策略性的公共意见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②。除了更传统的领域,譬如学术、管理和科学工作,现代形式的智力工作还包括媒体制作、网页设计等等各种文化和创意产业。第二种则是针对信息化渗入劳动组织过程这个变化而言的,不过按照乔治·索加的看法,第二种应该更感性化地被指认为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他认为,这也是哈特、奈格里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影响。非物质劳动这一最新术语的真正推动者是女权主义者,从传统意义上讲,这也注定非物质劳动总会直接涉及妇女。“服务业覆盖了从健康、教育、金融到交通、娱乐和广告等广泛范围内的各种活动。大多数工作是高度流动的,涉及各种灵活的技巧。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普遍特点在于以知识、信息、感情和交际为主角。”^③为什么他们会集中到这一点上来呢?因为这里正是指引后工人主义者的言说场域,即依据马克思的《大纲》所勾画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中出现危机,哈特、奈格里等人称之为“度量危机”。

依据哈特、奈格里的看法,资本主义本身是基于价值形式才能够对社会中的物给予量化,譬如借助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度量物的价值,从而商品社会的交换领域得以通畅,但是,随着非物质劳动占据经济生产的主导地位,一种可被称之为生命生产的经济重心,“从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到了社会关系的生产,而生产与再生产也日益混同。经济学家就所谓的无形价值(Intangible Values)和无形资产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分析主要依赖量化计算”^④。认知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是完全异质性的,哈特、奈格里基于这一判断,认为之前人们所理解的量化计算主要都是一种物质生产意义上的物体价值,“包括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普遍关注的是用计量(Measurement)和量化方法去理解剩余价值和剥削。但是生命政治则倾向于逾越(Exceed)这些量化计量”^⑤。也就是说,价值形式统治如果在物质生产中还能够成为“强制”的统治方式的话,到了生命政治生产中,这种统治方式会随着度量失效相应地丧失其统治力,恰恰是这种认知

动对价值形式的逾越就是不断地撞击资本主义统治边界,同时也为抵抗者开启了劳动自主性的可能,“资本剥削管控的机制与生命政治的生产力持续对立,并成为后者的障碍”^①。当然,最后哈特、奈格里依赖于诸众对解放的筹划,并未能真正地从价值形式化世界出走,其所设想的非物质劳动共同性生成也并未能汇聚到社会主义运动的解放事业道路上来,仅仅变成了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可能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在当下生命政治语境中,传统的基于同一性、领导集中制以及等级制的组织形式不再可欲或者有效”^②。而这一点,也是西方左翼思想未能在改造世界上真正有所作为的原因之一。

二、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与价值形式的“统治方式”

皮茨(Frederick Harry Pitts)在谈及新马克思阅读学派(Die Neue Marx-Lektüre)时,对其与后工人主义的区分有一个评论,他说“后工人主义引用经验性原因来具体地和有选择性地解读马克思。但是新马克思阅读学派采取了一种注解性式(Exegetical)路径。”^③这种注解性式的研究是以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介入到《资本论》第一版的价值形式阐述为基础的。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与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受教于阿多诺,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巴克豪斯在其著名的《价值形式辩证法》中直陈马克思的阐释者们对价值形式的理解之匮乏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多次提到价值形式分析的重要意义。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极力告诫人们不要忽视价值形式理论。^④我们知道,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做过如下陈述“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⑤“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⑥这两个“决没有消除”在今天有点令人惋惜的是,它也“决没有消除”人们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化”。巴克豪斯认为“当熊彼特质疑马克思的价值分析的独立性时,他代表了这样一些人的看法。”^⑦这个看法对于新马克思阅读学派来讲,正好错失了对马克思思想独立性的理解,因为,对于这些解释者来说,界定商品“神秘性”的正是价值量的“秘密”,而不是去探索“物的

d. 如何理解抽象价值对象性(Abstrakter Wertgegenständlichkeit) 起源: 主体以何种方式使自身“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 将自身作为相对立的客体(Objekt gegenüber)? 事物的这种神秘特性也可以用以下方式来描述, 产品的价值是一种不同于产品本身的观念。而另一方面, 价值也总是只是产品的价值, 因此以某种物质的“观念形式”(Ideelle Form) 出现。作为一种意识, 价值的意识是内在的。然而, 在它存在的这种方式中, 价值是不可知的, 它将自己作为相异的某物与意识形成对立。劳动产品的真实性(Realität) 已经被设定了。在这里有问题的只是劳动的产品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其现实性的奇异外形”, 而不是以此为本体(Ens qua em) 的构成。

毫无疑问, 巴克豪斯在这里提出的诸多问题足以体现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对价值形式的阐释思路。具体来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物被赋予的社会关系的建构机制是阐释价值形式秘密的根基, 这便涉及到新马克思阅读学派所强调的社会确认。当然, 这有着马克思的文本依据。虽然人们并不会意识到“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 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①, 但是他们一直在生活中习以为常地这样做了。这种赋予物的价值(社会关系) 其实如语言一样, 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劳动之所以能够作为价值存在, 根本在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赋予。(2) 抽象劳动理论是解释劳动如何凝结成为价值承载者即商品的关键。也就是说, 强调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表现, 交换改变了我们思考劳动和价值关系的方式。由此, 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并不强调直接劳动时间, 而是强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是存在于所有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劳动中的抽象的社会关系。“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 才取得一种社会等等的价值对象性, 这种对象性是与其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相分离的。”^② (3) 价值这种抽象关系的客观性问题。这是新马克思阅读学派最为看重的一个点, “观念形式”(Ideelle Form) 具有了客观现实性, 在巴克豪斯看来, 这种“既感性又超感性的事物”(sinnlich – übersinnliche) 的价值观念形式, 是指一种既不能归结为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和生理方面, 也不能归结为人类意识和无意识内容的一种特殊现实。抽象的价值对象性(Wertgegenständlichkeit) 是马克思的社会客观性, 它通过现实维度同时是主观的和客观的这一事实, 将自己与所有完全由自觉行动构成的社会关系区别开来。^③ 后来, 延续了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的普殊同将社会抽象的客观性和劳动、时间进一步结合起来, 细致地阐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和统治形式的理论分析。“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统治形式, 在根本上不是由私有财产,

开放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对于价值形式是否自治,则在普殊同、亚瑟·斯蒂安·洛兹(Christian Lotz)与开放马克思主义者霍洛威那里就完全不同了。普殊同、亚瑟高扬了价值形式却无意于给予其主体的位置,而霍洛威则强调价值形式不过是根源于劳动自身的分裂,资本主义内部没有自治,没有自我决定的可能。自治(或自决的意义)只能被理解为一个不断引导我们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障碍的筹划。^①基于此,霍洛威更多地将价值形式对人的统治看作是同一性,而抵抗价值形式也就是从非同一视角出发寻求解放的可能性。

三、概念的偏差与理解的真正出路

对于认知资本主义来讲,借助《大纲》展开的设想是,随着一般智力所引导的非物质劳动占主导后,共同性的生产带来了共产主义的新希望,从而价值形式理论便消亡了。而依凭于《资本论》的新马克思阅读学派,无论是早期还是当今开放马克思主义都始终将价值形式作为社会的主导原则。为什么西方左翼解读马克思的价值形式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他们的各自问题又出在哪里?除了《大纲》和《资本论》之间的差异性必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具有影响之外,我们还需要对他们各种理解的偏差进行评析,从而尝试建构一种阐释价值形式的可行性方案。

首先,认知资本主义实质上恰恰还是以李嘉图的观点看马克思,因而,其理解“非物质劳动”的思想棱镜是数量化的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可以肯定的是,在大工业时期的马克思确实认为非物质生产领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②,而与之不同的是,哈特、奈格里等认知资本主义者十分强调生产劳动向“非物质劳动”的转向,并借助非物质劳动呈现的“非物质化”的特征混淆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抽象劳动”,以为劳动经过数字化、智能化之后,就是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与智能化劳动的混淆必然使得认知资本主义关注的是价值形式的量,而忽视对价值形式的质的追问,也就是展开对涉及抽象劳动的价值本身的追问。这一点并不好理解,因为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性,“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③。对纯粹社会性的价值进行悬置,转而仅关注价值形式的量,其实还是处于“价值和劳动量”这对关系之内兜圈子,考虑的是劳动的等同性,因为从经验主义的视角来看,“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④,从而,他们将眼睛盯着交换中的“某种比例”(量)。可是,比例、量所体现出来的也并非价值本身的社会属性,而是“交换价值”,“2

劳动”为何依然以价值形式呈现,而这一追问必然涉及到对劳动为什么要以价值形式呈现的根本的“历史条件”的思考。

其次,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实体的劳动价值论,转向了以价值形式分析为主导的劳动价值论,更多地强调了劳动的“社会确认”的权力机制,而在对这一机制的前提追问上迷失了方向。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确实很好地避开了“度量危机”这种数量化劳动价值论的阐释僵局,可以看到,这一学派包括后来的开放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将价值实体化的看法,抓住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形式必须是一种社会有效的形式这一重点,这一点是所有与新马克思阅读学派相关的思想家的基本共识。之所以如此,与他们延续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票面思维”(ticket-thinking)的批判相关,从而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在靠近马克思的意义上,主张社会和历史的关系要渗入到事物的形式分析中去,根本上超越了认知资本主义的那种经验主义的做法,即把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票面价值(ticket-value),抓住了抽象劳动的社会性与价值形式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这是打破李嘉图化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阐释的关键所在。所以,商品的含义就不能仅仅是劳动的对象化,而且这一对象化最后还得交给“社会确认”。譬如,一个商家生产了一批货物,赋予这些货物的对象化获得是否有效,是需要看他能否成为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这种强制性正是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建构与传承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入口,因为强制性中便暗含权力的生产。但是,如果说认知资本主义朝向了具体劳动的一边(非物质劳动就是具体劳动),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则朝向了抽象劳动的一边,将所有的具体劳动的意义给抹杀掉了。诚如皮茨所指认的那样,对某种带价值的特定物品的生产起作用的具体劳动之特殊性必须被否定,才能使该物品成为等价物与其他物品进行交换。因此,赋予这一特殊性的活动——具体劳动——也必须从该物品中抽象出来。正是货币使之成为可能。货币建立了一种抽象的人类劳动的衡量标准,一般来说,它负责生产可交换的东西,抽象劳动被带入到现存的商品交换之中。^①虽然海因里希一再强调不要在生产或者流通这种非此即彼的视野中来看待价值形式,而应该将它们纳入价值形式的整个逻辑之中^②,但是,实质上,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彻底地贯彻这样一个原则,之所以如此,在他们看来,生产的归属权最终还是在交换那里,“在实际交易前确定投入生产以获得货币形式的直接私人劳动的数额,这是不可能的”^③。由此,新马克思阅读学派自然地关涉价值形式支配生活世界的普遍性,成为了一种“他律的”客观存在,新的总体性、同一性原则。以阿多诺为底牌但又吊诡地以阿多诺为批判对象——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勾勒了现实只是价值形式的呈现,如莱希尔特直言“马克思的‘资本的一般概念’与黑格尔哲学存在着结构的共同性(strukturelle Gemeinsamkeit)。”^④

异,更不生搬硬造,尽可能体现原有特色风貌……着力建设绿色、森林、智慧、水城一体的宜居新城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努力建设绿色低碳新区。”^①雄安新区是一块试验田,生态文明建设搞好了,不仅会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城市,还将成为实施“生态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通过“雄安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而加快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为实现生态强国目标夯实基础。其次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绿色经济带”。“一带一路”战略之所以能够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广泛响应积极参与,主要是因为各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过交流互通实现经济共享、政治互信、文化交流、环境共建等目标。路上丝绸之路恶劣的沙漠环境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污染很难承载庞大的经济发展体量,所以说构建丝绸之路绿色经济带是首要任务,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必须开展生态环境的国际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为此发达国家和地区应给予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一定的技术支持和环境援助。基于对当前国际形势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影响力的继续提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定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推广到“沿线国家”,成为构建丝绸之路“生态”经济带的指导思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沿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效,造福沿线各国人民。2016年9月,中国“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正式启动,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卫星遥感等信息技术,收集整理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数据,服务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全球生态家园提供技术保障。第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生态宜居新乡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继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实效的一个判断标准:(1)建设生态宜居新乡村必须以生态产业为支撑。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指导思想,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循环使用废弃资源,实现生态农业的循环发展。(2)构建生态宜居新乡村,必须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农村生活环境不仅包括农村的自然环境,还包括农村的内部环境。自然环境情况取决于空气质量、自然资源开发度、水质情况、土壤肥沃程度等。内部环境主要指的是村容村貌,例如乡村卫生设施建设情况、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道路、健身器械等建设情况)。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现有乡镇级行政区划39755个,将近70万个行政村。如果每个行政村都在建设美丽新乡村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扎扎实实的进展,使所有的生态宜居新乡村连成一片,那么我们的生态强国战略的实施就有了坚实的基地和充沛的动力。

(责任编辑:周文升)

(上接第41页)一种表现,不过,它仅限于在交换价值的意义上,但是价值的创造却不在交换之中,只是在